

民国时期张岱年先生的二程研究*

曹树明

【提要】基于将中国哲学主干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总体框架,民国时期的张岱年对二程进行了独特而细致地分析。具体而言,涉及归纳二程之同、区分二程之异、定位与评价二程学说三个方面。张岱年的二程研究兼采中西之长、坚持史论结合。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与其新唯物论哲学体系的建构呈相辅相成之势,亦得益于其明确的哲学史方法论。

【关键词】民国 张岱年 二程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6-0016-09

民国时期,二程(程颢、程颐)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蔡元培、谢无量、冯友兰等学者都曾有过相关探讨,张岱年也是其中之一。在其时发表的《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谭“理”》、《中国知论大要》、《中国思想源流》、《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等论文中,张岱年皆或多或少地论及二程,其1935年到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更是较为系统地阐发了二程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遗憾的是,这些贡献却殊少纳入学人视野。本文则以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心,以该书所分作为中国哲学主干之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为问题导向,对张岱年民国时期的二程研究进行发掘。大致而言,关涉归纳二程之同、区分二程之异、定位与评价二程学说三个方面。

一、归纳二程之同

程颐曾说:“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

也。”^①可知他自己认为,其思想与其兄程颢的思想属于同道。由此,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程颐在其兄去世后思想上有所发展的事实,但二人思想的相同之处却是不能忽略的。然而,总观民国时期的二程研究可知,其时的学者固然多注意到上引程颐的话,可在阐发二程思想时却又多是将二人分述,且注重的是他们各自不同的问题域,如蔡元培从“性善论之原理”、“善恶”、“仁”、“敬”、“忘内外”、“诚”几个方面讲程颢,而从“理气与才性之关系”、“心”、“养气寡欲”、“敬与义”、“穷理”、“知与行”几个方面讲程颐;^②谢无量从“宇宙观”、“伦理说”两个角度,^③贾丰臻从“宇宙观”、“伦理说”、“修

*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4C05)。

① 朱熹:《伊川先生年谱》,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6页。

② 参见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宋明理学时代”,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21~31页。

③ 参见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26~37页。

为说”三个角度讲二程,^①但均是主要分析二人思想之异;钟泰以“识仁说”和“定性书”两个主题讲程颢,而以“主敬”和“穷理”两个主题讲程颐;^②陈钟凡亦是分述“程颢之一元学说”和“程颐之理气二元论”。^③与以上诸人不同,吕思勉走向另一反面,以为二程的“学问宗旨,则无不同也”,“故合为一篇讲之”,^④从而基本忽略了其思想的相异之处。冯友兰则认为,“二人之主张虽异,而其所讨论之问题,则大致相同”,所以他在“天理”、“对于佛氏之批评”、“形上,形下”、“气”、“性”、“阴阳,善恶之消长”六个问题下“分叙二人之说,比较论之”,同时另设两节讲述“明道所说之修养方法”、“伊川所说之修养方法”。^⑤这在民国时期二程异同问题的处理上,可谓相对得当。

在某种程度上说,此时期张岱年的二程研究在思路上与冯友兰是一致的。这种思路可概括为“同中见异”。虽然思路相同,但二人对二程的阐发各有特点。比较而言,张氏之说较冯氏之说更为全面和细致。

关于二程之同,张岱年从宇宙论、人生论两个方面进行归纳,这不能不说是二程研究上的一大进展。

张岱年为宇宙论设置了本根论和大化论两个维度,本根论即对宇宙最究竟之本原的探究,大化论则指对宇宙变化历程的讨论。张氏指出,中国哲学家以为本根是无形的、形而上的,并非万物中的一物,但本根与事物却不是殊绝的关系,而是体用统一的关系;对于这种统一关系,宋明道学家言之最详,二程则是其中的典范,因为程颢曾说“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程颐亦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⑥具体到本根论中二程的理气关系,民国时中国最通行的看法乃采自日本。宇野哲人的《二程子の哲学》(东京:集文阁,1900年)和高濂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东京:文盛堂书店,1910年)皆以“明道为气一元论,伊川则说理气二元”,^⑦谢无量、贾丰臻、陈钟凡则都继承其说。^⑧首发异论的是冯友兰,他认为程氏兄弟均常言天理或理,而对于气,“明道未多言气,伊川则多言之”。^⑨张岱年

则提出,二程都属于理气二元论,原因是“二程子皆以理为究竟本根,气为其次”;他还补充道:“又以其皆以理为宇宙中之最究竟者,亦可谓唯理论。”^⑩这在那时是个颇具新意的观点。据笔者目力所及,几乎与张岱年同时提出此说者仅见蒋维乔、杨大膺之《宋明理学纲要》,^⑪且两方的立说根据不同。在大化论的维度,张岱年注意到二程的三点相同:第一,与周敦颐、张载等宋代哲学家一样,二程也都认为宇宙是生生不息的大流,一切事物都在变动中;第二,“二程子最注重两极现象,认为天下事物莫不有对,无往而无对”,^⑫对待乃生生之本或变化之因;第三,二程都认为宇宙是无所谓始终的。我们认为,这些从性质或时间的角度对二程关于宇宙变化历程之讨论的分析,乃基于张岱年对发掘中国哲学史中的辩证法因素的重视。事实上,早在1932年,张岱年就已在辩证法的论题下探讨二程所云“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天地之间皆有对”等话语了,但他认为,相较于张载,二程的辩证法思想“简单多了”,

① 参见贾丰臻:《宋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40~61页。

② 参见钟泰:《中国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2~30页。

③ 参见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74~124页。

④ 参见吕思勉:《理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78页。

⑤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68~894页。

⑥ 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⑦ [日]高濂武次郎著,《中国哲学史》下卷,赵兰坪译,国立暨南学校出版部1925年版,第58页。

⑧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第32页;贾丰臻:《宋学》,第51页;陈钟凡之说稍有不同:“颢持神气合一之议,超于周张二家而主一元;颐更会合两家而主理气二元之论焉。”(《两宋思想述评》,第91页)

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880页。

⑩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1页。

⑪ 蒋维乔、杨大膺:《宋明理学纲要》,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2页。

⑫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22页。

且“程颐实无合的观念”。^①

在人生论部分关于损与益问题的讨论上，张岱年指出，儒家的孔孟荀主益，道家的老庄则主损，宋明道学家中，张载是主益的，程朱和陆王两派在别的问题上虽多宗述孔孟，但在此问题上却更多受老庄的影响而皆主损，然其说又与老庄不同，因为道家反对“学以求复其初”，而程朱和陆王正是如此主张。张岱年认为，程颐所谓“学者今日无可添，只有可减。减尽便无事”是在讲“减”，其“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心”亦是讲“减”，“减”即是一种“损”；程颐所说“（天德）若少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则是“复初”之“损”。二程之所以会主损，乃由于“他们认为人之性本来圆满，后为形气所累或物欲所蔽，于是有不善；理想是去掉此种形气之累或物欲之蔽，以复返于原始的状态”。^② 这里，张岱年将二程之主损与其人性论关联起来，体现出他对二程思想的把握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二、区分二程之异

在归纳二程之同的同时，张岱年亦从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方面分析其同中之异。

首先，关于本根论中之理气论。1933年，张岱年发表《谭“理”》一文。他认为，程颐的理兼具“规律”、“所以”和“至当”三重意谓，依据在于“‘所以’，也实是一种规律；一物之所以，也可以说即是一物所根据的规律”；另，“中国哲学家常不分自然与当然”，故而在程颐那里，“‘理’不只是物事自然之规律，又是其当然之表准”。^③ 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进而指出，二程虽同主理气二元论，但二人所谓理的含义有别：“程明道所谓理乃指生生之理，以生或易为宇宙之根本原理。程伊川所谓理，则指气之所以”。^④ 这两种理都包含规律的意思，但程颐的理在规律的意谓中更主要是所以的意思。于程颐，宇宙本根必须是事物之最根本的常则，他称之为“天理”，此“天理”即是生生不已的宇宙之根本原理。正因为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所以“明道不讲所以然，

而认为根本无所谓因甚有，因甚无”。^⑤ 此前，《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一文论及程颐的“天理”时，张岱年只说“天理者犹今云普遍规律，乃自然一定之理”，^⑥ 并未具体解释此“自然一定之理”究为何种“理”。比之更进一步，《中国哲学大纲》明确说明其是“生生之理”。而在程颐的观念里，宇宙本根是一切事物之究竟所以，此究竟所以即是他所谓的理。这个理，对程颐而言，是构成万物的气的“所以然”，是一切之根本，其内涵“兼赅自然之理与道德应当之理”，^⑦ 并且万理只是一理。

其次，在人生论方面，张岱年对二程之异进行了多维透视：一者，关于天人关系。二程皆论天人相通，但程颐较注重心；程颐较注重性。二者，关于人性。程颐论性的话少而浑沦圆转，内容颇近于告子；程颐论性则颇简明，有理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属于性二元论。张氏还为程颐的性论寻找宇宙论的根据：“伊川的宇宙论本可以说是两元论，认世界为理与气所成，由之而讲人性两元，颇为自然。理性即是为宇宙究竟本根之理，气质之性则原于气。”^⑧ 三者，关于心。程颐提出，知是心之本质；程颐则认为，心性情三者是一，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心是性之存诸人而有形的，情是性之动而发于外的”。^⑨ 二程又分别人心与道心，但程颐以为二者之别即是人欲与天理之别，程颐则似认为与道心相对待之人心，非一般所谓人心，而是指放其良心者。四者，关于人生理想。在《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一文中，张岱年

① 张岱年：《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页。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434页。

③ 张岱年：《谭“理”》，《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97、96页。

④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1页。

⑤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5页。

⑥ 张岱年：《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9页。

⑦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6页。

⑧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16页。

⑨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40页。

即认识到：“二程所说修养方法，实有独到之处。”^①惜乎该文没有就此展开探讨。在冯友兰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中国哲学大纲》则将二程之修养方法与其人理想论关联起来进行分析。张岱年认为，程颢以浑然与物同体之仁为生活之最高境界，而这种人理想论，亦是由其宇宙论而来。亦即，将作为宇宙根本原则的生生之理表现于生活，便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之境界。在程颢，欲达到此种境界，须修养到满腔子是恻隐之心的程度，而真正进入此种境界后，则只须常常存念而不忘，更不须用纤毫之力。程颐以“与理为一”为人生之最高境界，以居敬穷理为修养的根本工夫，这种境界与工夫的提出亦是基于其最注重理的宇宙论。张岱年还指出，与程颢不同，伊川的最大特色是，最注重知识与生活的关系，而不赞成与万物一体的神秘生活。五者，关于人生问题。程颢主严辨义利，其所谓利专指私利，程颐以公私为义利的分别，其根本意思是主张公利而反对私利；程颐论命，与程颢意思相同，然更明晰确切；程颢关于理欲之辨的内容不多，程颐则较多；二程论情较精，程颢主以情从理，而不主全无喜怒，程颐主心本无怒，极注重役物而不役于物。

再次，在致知论方面，张岱年从两个维度厘清二程：其一，知识的性质与来源。1934年4月，张岱年发表《中国知论大要》一文。其中尚只提及程颢，认为他区别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主“即物穷理”，但其“物”“非只外物”，“要之，伊川以为知识由经验来”。^②《中国哲学大纲》则涉及二程二人，并指出其思想差异：程颢很有认为知识来源于内心的倾向，且其知即是天理，以道德的知识为主；程颐则将知识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二种，其中闻见之知是得自于感官的对于特殊事物的知识，而德性之知则是对于普遍原理的知识，不源于感官，且两种知的所以知之能与所知之理，都是吾所固有的，然心中之理须待格物才能得之。也就是说，程颢“兼综知由于内与知原于外两种思想而成一说”。^③其二，致知的方法。《中国知论大要》认为，程颐的“求真知之道”是“致知，

须要有道德修养”。^④在此维度，《中国哲学大纲》则亦是区分二程之说，且对程颐的看法有所深化：程颢以直觉为方法，主张反求于内，作内省工夫；程颐则以格物穷理为方法，兼用理智与直觉，注重察之于身，更注重对于外物的考察。张岱年阐发道，程颐的方法，“表面看来，似颇近于科学的方法”，实则与科学通过“精密的归纳”获得“通则”不同，它是“观察事物既多后，乃觉悟到通则”，且异于一般直觉法“由心直接领会宇宙之全体”，它是“由部分以及全体”，故而需“参用直觉与思辨”。^⑤

张岱年的如上分析堪称精到，在民国乃至当今学界对二程之异尤其是对其在各种人生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作如此细致的区分者，并不多见。在有关论述中，张氏既善于吸收时贤新论，又能对之进行甄别拣择，进而在很多方面提出卓见。如，关于二程之理的不同。张岱年之前，冯友兰亦曾析解。他指出，程颐的理“即一物之所应该”，且可以离物而独存，“略如希腊哲学中之概念或形式”；程颢“所谓之天理或理，则即具体的事物之自然趋势，非离事物而有者”。^⑥与冯氏相比，张岱年的解释多有创获：程颐的理“兼赅自然之理与道德应当之理”之说，即显然较冯氏更为准确，因为程颐明确说过“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⑦的话，而“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是不能用“一物之所应该”来概括的。程颢的天理是生生之理的观点，则不仅揭示了冯氏所云程颢之天理为“事物之自然趋势”中“自然趋势”之内涵是“生生”，且较之冯氏之说，多了一层对天理之形上意蕴的彰显。再如，关于程颐之格物与近代的科学方法的关系问题。并世学者胡适即把程朱之格物致知视为“确是

① 张岱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下）》，《出版周刊》新127号，1935年5月4日。

② 张岱年：《中国知论大要》，《清华学报》1934年第2期。

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06页。

④ 张岱年：《中国知论大要》，《清华学报》1934年第2期。

⑤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49页。

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873、875、876页。

⑦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47页。

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①只是“全不注重假设”，^②而“终要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觉悟”，则“是程朱的根本错误”。^③其结论纯是以西释中的产物。与之不同，张岱年不仅看到了程颐之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相近之处，而且看到了二者的差异，对其中差异的揭示充分展现了张岱年对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颇深体会。针对二程之致知方法，钱穆于1931年出版的《国学概论》里亦曾概括说：“盖同一合内外之道也，伯子向其内，而叔子向其外。”^④较之钱氏对程颐的致知方法之“直觉”一面的忽视，张岱年的观点也显然是更为透彻的。

三、定位与评价二程学说

在二程研究上，张岱年还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其进行思想史定位，并对其思想做出评价。本文所谓横向定位是指对二程学说与其同时代的北宋思想家学说之关系的厘定，纵向定位则指对二程学说进行跨时代的源流考索。

（一）横向定位

远在张载去世后不久，即有讨论关洛关系者。从张门转投程门的吕大临就曾讲张载见二程后“尽弃其学”，后因程颐批评他“几于无忌惮”才将此句改为“尽其异学，淳如也”。^⑤二程的另一弟子杨时也宣称“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⑥游酢《书明道先生行状后》亦曰：“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⑦南宋时期朱熹所谓“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⑧的论断无疑巩固了此说，甚至使关学源于洛学成为得到普遍认可的学术谱系。而如上说法都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作为洛学创始人的程颐自己就断言：“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⑨此中最当注意者是“谓颐兄弟有同处”一语。这句话将“颐兄弟”设置为主语，表明即使关洛有相同之处也是洛学同于关学，而非关学同于洛学。故而，关学源于洛学的观点乃是二程弟子的门户之见，与历史事实未必相符。作为现代学人，张岱年在序列了北宋五子的年岁和卒年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地描述了洛学与

关学乃至周敦颐、邵雍的关系：“二程少曾受学于周敦颐，与邵、张亦在师友之间，故能吸收周、邵、张的学说而作更进的发展，所以其思想较为圆熟”，“邵张思想之完成年代先于二程甚远。二程成熟虽早，然其思想亦必多发于晚年者。盖张子谦逊善让，其学又未得传人，而二程则以先觉自居，弟子亦最盛。门徒附会，至有谓张曾学于程者，小程曾亲自否认之。然程门后学言先后次序，皆先程而后张，实一派之私见而已。程学之能独盛，实由其在周邵张之后，能采数家之长而作更进之发展”。^⑩

论及北宋五子的具体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张岱年也从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个角度解析。

首先，在宇宙论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本根论包括唯理论、唯气论和主观唯心论三种类型，此三者在哲学史上是相生互转的，尤其体现在宋以来的哲学中。^⑪就对二程学说的横向定位而言，张岱年指出，张载主张气论，并以气之变化有其必然的理则，于是二程以此必然的理则为气之根本，遂成立唯理论。由于张载的气论“不曾得到传人”，更为二程的理气

① 胡适：《格致与科学》，《胡适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②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全集》第1卷，第367页。

③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全集》第6卷，第471页。

④ 钱穆：《国学概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8页。

⑤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14、415页。

⑥ 杨时：《杨龟山先生全集》，（台）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1055页。

⑦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34页。

⑧ 朱熹：《伊洛渊源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⑨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14~415页。

⑩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第21、22页。

⑪ 关于宋明理学的派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及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都划分为程朱、陆王二派。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首次将张载学说概括为唯气论，将二程学说概括为唯理论，将陆王学说概括为唯心论。他的这种分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里即已经放弃自己早年的观点而采用张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论所掩，“于是理气论大盛，而气论衰微”。^①关于宇宙的演变历程，则是张载一派以为变较理为根本，二程以常（即所谓理）较变为根本。但是，谈及宇宙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周、邵、张、程则都根据《易传》而指向“神”，“神是所以运动变化者，是生生之内在动力。语化之妙，则以神言之。大化奇妙无方，其内在的变动功能，微妙不测，故谓之为神”。^②晚年时，张岱年先生对这种说法有所修正：“张载论神，有时分别‘清浊’，以为‘清’最能表现神……程颢加以批评……神既是气的本性，则浊者亦不可谓无神。但是，清者之神与浊者之神二者的差异应如何解释，张程都没有谈到”，“程颢与张载、程颢不同，不以神为他的学说的范畴”。^③

其次，在人生论的角度，张岱年指出，张载和二程都主性二元论，但程颢的性二元论不如张载所说明显，且张载所谓天地之性是气之本性，为一切所共有，所谓气质之性是气聚成形而后有之性，为一物所特有，二程所讲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不同则是理与气的不同；张载讲心统性情，程颢则谓心性情三者是一。张岱年亦就两个人生问题定位关落。他指出，张载的“义公天下之利”与伊川之义利对立而统一的思想，意思可谓相近；张载讲义命合一，但以常然者为命，以偶然者为遇，“二程论命，甚为精辟，其要旨亦可谓近于张子所谓义命合一，然而反对张子分命与遇为二之说”。^④

最后，在致知论的角度，《中国知论大要》和《中国哲学大纲》皆主张，宋代新儒家中，张载最初论及知识，将知识分为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两种，程颢继承张载之说，亦分知为二。然而，张岱年民国时并未认识到张载“德性所知”与程颢“德性之知”的不同。他在1987年完成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里则更进一步，指出：“张氏所谓‘德性所知’指‘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认识，程氏所谓‘德性之知’则是内在的自我认识”。^⑤

（二）纵向定位

关于二程研究，冯友兰一直“引以自豪”^⑥的是他将二人的思想区分开来，且谓“程伊川

为程朱，即理学，一派之先驱；而程明道则陆王，即心学，一派之先驱也”。^⑦提出此说的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卷面世（1934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前的1934年1月25日，张岱年发文称二程属于中国思想潮流之“再度的合”的阶段，且肯认他们和周敦颐、张载是正式成立新儒家的人。^⑧读到冯著后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则继承并发展冯氏的观点，称“始于程颢，大成于朱熹”的一派为“唯理的潮流”，称“导源于程颢，成立于陆九渊，大成于王守仁”的一派为“主观唯心论的潮流”，前者“以居敬穷理为宗旨”，宣称“性即理”，后者“主张发明本心”，“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虽以小程为宗，但也综合周、邵、张及大程的思想”。^⑨这是总说。此外，尚有从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等视角的分述。

关于宇宙论，张岱年认为，二程之理的观念渊源于先秦，但与之有一大不同点，即先秦所谓理皆以分殊言，而二程所谓理则以总一言。分而言之，程颢以生或易为宇宙的根本原理，思想渊源是《易传》，程颢的理则是先秦道家之道的观念的变形。涉及到二程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张岱年有二说：其一，朱熹所谓太极比程颢的理更接近道，因为“在伊川，不会明言理在气先；在朱子，对于宇宙发生历程的研讨颇为注意，关于天地未生之前，何者先有不容忽视”，而朱熹的想法与“老子庄子都以为道在天地之先”^⑩是相同的。其二，受张、程影响，朱熹注重对待合一，认为一切事物皆有对，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74页。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36页。

③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岱年全集》第4卷，第554页。

④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409页。

⑤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岱年全集》第4卷，第696页。

⑥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869页。

⑧ 张岱年：《中国思想潮流》，《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6、197页。

⑨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第26~27、22、23页。

⑩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64、58页。

对立遍于一切。此外，在张岱年看来，若追溯渊源，二程的理气二元论，汉代王符的道气二元论即开其先河。

关于人生论，张岱年的结论关涉四个维度：第一，天人关系论。朱熹与陆九渊此方面的思想皆不出二程所说的范围。第二，人性论。程颐的性二元论创始于张载，精炼于他自己，大成于朱熹。第三，人生理想论。明道之“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人生理想论虽以孟子为本，但亦综合了庄子的思想，伊川“与理为一”的人生理想则由朱熹发挥，他以“心中天理流行”为修养之最高境界，更以之为“仁”的境界，陆九渊专重内心的人生理想论则在程颐那里即有此倾向。第四，人生问题论。对于命的态度，二程比孔孟更注重人事，提出“不必言命”，惟以义为主，是一种颇新见解；孟子讲扩充良知良能，明道则讲回复良知良能；受周子主静的影响，二程也颇有重静的倾向，但不完全主静，而讲定与敬；二程论情的主要意思同于王弼，只是比他更明晰详细。

关于致知论，张岱年主要考察程颐与朱熹、程颐与陆九渊的关系，也涉及对二程之说在先秦的思想渊源的追溯。张岱年认为，程颐的知为人所固有而必格物以致之的学说，朱熹更发挥之；程颐兼用直觉与思辨的致知方法，朱熹更是完全与之相同。此种致知方法，从根本上说乃“导原于荀子及《易传》”，邵子、张子的方法也都是如此。^①程颐则不同，他的方法乃“全从孟子来”，^②是纯然直觉。其后，陆九渊继承他的方法：“以反求为方法，认为求知宇宙之理，不可求之于外，而当反求于内。”^③

（三）评价

总体观之，对于二程，张岱年肯定得少，否定得多。首先，关于程颐。认为其长处“在于宣扬‘即物穷理’，由以达到人生之最高境界；对于知识与人生之关系，还算是有所见”；^④其不足体现在：第一，性即理说。《中国哲学大纲》主张，性即理说在宇宙之理的意谓下失之玄秘，在人伦之理的意谓下“认为道德乃原于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有一定的根据”，相对于此，理在事说最为得实，惜未有充分的发展。^⑤

而张岱年1938年后几年间的思想札记则直斥“性即理”为“妄说”。^⑥第二，理生（欲）关系。张岱年认为，程颐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充分地表现出重理派的态度：“凡作事只问于理应该不应该，不管生活的实际”，^⑦而“无见于生必（引者按：“必”字疑衍）之本质，不重视生命力或活力之充实与发挥。……活力衰薄，则一切德行都是空虚的”，因此理欲之辩“更不能照旧维持”了。^⑧其次，关于程颐。1933年，张岱年发表《辟“万物一体”》一文。文中未提具体哲学家的名字，但程颐无疑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张岱年强调，万物一体的境界可以让人心境扩大，免于当下烦恼，充满好生的仁意，然而除此之外这种神秘境界“实并未有了不得的价值”。^⑨不止于此，对于“导源于”程颐的陆王心学，张岱年亦主张其“简易直截的内心修养法”在今日复杂的社会生活里已经不切合了，“心学的其它唯心的理论，在今日看来，更多是陈腐的”。^⑩张岱年的二程评价，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同作为二程之理论根基的理气论也是持批判态度的：理气论于理之外兼言气，“是一种二元论，然终以理为最究竟者，是一种客观唯心论”，^⑪这是“对于物有其规律之事实之不正确的解析”，^⑫因而是必须改造的。

综上所述，在对二程学说的思想史定位上，

-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28页。
-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46页。
- 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51页。
- ④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世界动态月刊》1936年第1期。
- ⑤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49页。
- ⑥ 张岱年：《认识·实在·理想》，《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432页。
- ⑦ 张岱年：《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81页。
- ⑧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世界动态月刊》1936年第1期。
- ⑨ 张岱年：《辟“万物一体”》，《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82页。
- ⑩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591页。
- ⑪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89页。
- ⑫ 张岱年：《认识·实在·理想》，《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436页。

张岱年运用科学化、理性化的现代学术方法，得出许多客观而平实的结论。如，通过序列北宋五子的年岁和卒年，来分析北宋理学家尤其是关、洛二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即是摒弃门户之见，是哲学史研究科学化的表现。又如，在二程与朱熹、陆王的关系问题上，冯氏之前，贾丰臻即认为，王阳明的先驱是程颐，而非程颢。他立论的根据有二：第一，伊川所讲“见闻之知，就是普遍智识；德性之知，就是天赋良知；扩充良知，就是致良知”；第二，“伊川的知行合一说，亦为王阳明的先驱”。^①在第二点上，贾氏尚且指出了伊川重知而阳明重行的不同，在这一点上他则根本未意识到二人的思想差异。其实，程颐从没有说过“扩充良知”的话，贾氏引以为据的“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等程颐的话语也并不能推出他主张“扩充良知”的结论。程颐曾明确释其“致”为“尽”，^②故而其所云“致知在格物”意为通过“至”物穷理而达到“尽”知的效果。这和王阳明之本体与工夫合一的“致良知”之间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如此看来，在纵向定位二程学说时，张岱年选择继承并发展冯友兰的观点而未采纳贾丰臻之说，亦显示了其判断的理性化。再如，认为先秦所谓理皆以分殊言，而二程所谓理则以总一言；程朱的致知方法兼用理智与直觉，而陆王的致知方法则是纯然直觉，等等，在其时也是颇具创新意义的见解，其中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关于二程思想的评价，则处处体现张岱年的哲学立场。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致力于新唯物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他主张，宇宙是“一本多级”的：“物”是最基本的存在，“生”与“心”皆从“物”出。基于此种哲学理念，其中国哲学史研究注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阐扬。张岱年认为，唯物论虽不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但也有其传统，尤其是近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代表“主潮”的王夫之、颜元、戴震的事学，其“宇宙论与人生论，是比较上最为正确的”，^③“都是倾向于唯物的”，然而“都不甚成熟”，故“新的中国哲学，应顺着这三百年来的趋向而前进”。^④而在唯物论，超时空的离

物自存的理、离开了生或欲的理、万物一体的神秘境界，尤其是主观唯心论，皆在反对之列。由此可以说，张岱年对二程做出如上评析乃基于唯物论的思想立场。

余论

民国时期，张岱年把中国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大理论模块，去探究二程之同、之异及其思想史地位，进而站在唯物论的立场对其思想作出评价，其二程研究堪称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水平。

就特点而言，张岱年的二程研究至少有二：一是兼采中西之长；二是坚持史论结合。事实上，这两个特点与其哲学史方法论又是紧密相连的。在《中国哲学大纲》的“自序”中，张岱年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四种方法，即“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和“辨其发展源流”。^⑤其中，“析其辞命意谓”和“察其条理系统”鲜明地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汲取，前者吸收了西方的逻辑解析法，后者采纳了西方注重的形式系统。具体到二程研究，张岱年以程颢之理为生生之理、程颐之理为气之所以，并分宇宙之理和人伦之理两个维度评析其“性即理”说，就表明其对辞命意谓之逻辑解析的重视；而他将二程的主损观念与其人性论关联起来，为其人性论追溯宇宙论的根源，就是对其整个条理系统的考察。通过这种分析，始能对于二程“所讨论的一切哲学问题，都予以适当的位置”。^⑥在摄取西方学术营养的同时，张岱年亦不忽视中国哲学的特色。如上所示，他沟通程颐的方法与西方的

① 贾丰臻：《宋学》，第58、59页。

② 朱熹：《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页。按：《河南程氏遗书》卷18此条脱“致，尽也”三字。

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世界动态月刊》1936年第1期。

④ 张岱年：《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3页。

⑤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第18~19页。

⑥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第19页。

科学方法，但又区分二者，揭示程颐格物致知说的中国性征。“审其基本倾向”和“辨其发展源流”则与张岱年秉持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立场具有一致性，二者分别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哲学史方法论上的应用。落实到二程研究，张岱年判定二程之理气论为客观唯心论，即是运用唯物论来审其基本倾向的表现；而他从纵向对二程进行的思想史定位，则是运用辩证法来辨其发展源流的展示。进言之，其新唯物论的思想体系与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相辅相成之势，正是通过发掘中国哲学中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元素，并运用唯物辩证法衡论各个理论流派的哲学思想，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的创造上皆做出了独特和重大的贡献。

当然，张岱年在二程研究上的某些观点并非不可商榷，如相对于其承自冯友兰的陆王导源于程颢的观点，牟宗三就持有不同见解：“象山对于北宋诸家未曾多下工夫，亦不是承明道而开出，尤其不喜伊川……他是读孟子而自得之”；^①相对于其程颢之理为生之理，程颐之理

是气之所以然的主张，唐君毅也存有异说：“程明道言‘天所付与之谓命’，下文言‘禀之在我之谓性，见于事业之谓理。’又言‘在义为理。’则此种理明为成人之正当之行为事业之当然之理，并与天性命相通贯为一者。程伊川谓‘己与理为一’并言‘性即理也’，即将明道之言，凝聚于一语之中”。^②然而，张岱年在二程研究上的特点以及某些想法，时至今日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本文作者：哲学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1页。

②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Zhang Dainian's Study of the Cheng Brothe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ao Shuming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Zhang Dainian analyzed the Cheng Brothers specially and carefully within his general framework in which he divided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to cosmology, life theory and epistemology. His analysis covers three aspects: revelation of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heng Brothers, distinction of their differences and evaluation of their theory. Zhang's study of the Cheng Brothers is characterized by his skillful use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academic methods and his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with historical reviews. These achievements profited from the clear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his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also helpe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new materialism.

Key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Dainian; the Cheng Brothers